

杨素功过辨正

刘 明

(常熟理工学院 管理工程系, 江苏 常熟 215500)

摘 要: 杨素是一位对隋朝兴亡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一生战绩辉煌, 为隋的建立及其政权的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 是开国功臣, 但称不上功臣之首。他排斥异己, 陷害忠良, 营私易储, 助广夺嫡, 杨广即位后施虐政而乱天下, 隋因之而亡, 但杨素不是隋亡国元凶, 只是帮凶。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 杨素; 隋朝; 开国功臣; 亡国帮凶

中图分类号: K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794(2006)05-0062-05

杨素(?—606年)字处道, 弘农华阴人, 出身于关陇集团的军阀贵族世家。他“少落拓, 有大志, 不拘小节”^{[1] 1281}, 勤奋好学, 对古代典籍“研精不倦”^{[1] 1508}, 才华横溢, 文武兼备。历仕隋文帝、炀帝两朝, 因功官居尚书令、太子太师、司徒, 爵至楚公。

一、问题的提出

杨素是一位对隋朝兴亡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一生战绩辉煌, 为隋的建立及其政权的稳定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他排斥异己, 陷害忠良, 营私易储, 助广夺嫡。而隋炀帝却是一个亡国之君, 故自唐代开始对炀帝极尽贬毁, 杨素也就难逃其咎。如唐太宗认为“杨素欺主罔上, 贼害良善, 使父子之道一朝灭于天性。逆乱之源, 自此开矣”^{[3] 200}。《隋书》中说杨素“兼文武之资, 包英奇之略, 志怀远大, 以功名自许。……考其夷凶静乱, 功臣莫居其右, ……然专以智诈自立, 不由仁义之道, 阿谀时主, 高下其心, 营构离宫, 陷君于奢侈, 谋废冢谥, 致国于倾危。终使宗庙丘墟, 市朝霜露, 究其祸败之源, 实乃素之由也”^{[1] 1296}。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到:“素卒比附逆广以推刃于帝, 夫岂天夺其衷与?”“隋之诸臣, 唯素之不可托也为最, ……素者, 天下古今之至不仁者也。……人之不仁至于此极, 而犹知有君之不可弑乎? 犹知子之不可弑父而已弗与其谋乎?”“文帝之

察也, 肘腋有杨素之奸而信之笃, 宫闱有逆广之凶而爱之专, 卒以杀身而亡国”^{[4] 552-555}。范文澜也认为杨素“凶狡”, 是助杨广杀害杨坚的奸人^{[5] 8}。

进入1990年代, 史学界对杨素的评价有所变化, 有人开始为杨素翻案。如沙宪如认为杨素“既是隋王朝建国安邦的功臣之首, 又是祸国殃民, 导致隋王朝灭亡的元凶”^{[6] 69}。刘思怡认为杨素“为隋的建立及其政权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助杨广夺宗也不能全盘否定。他的一生, 功劳大于过失, 是一个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7] 72}。西方学者崔瑞德则认为杨素是“为隋文帝的‘出谋划策的人物’。他的名字与全面的改革措施无关, 几乎只与远征和军务有联系。他鲁莽无情, 傲慢自负, 但以那暴力年代的标准来衡量, 他是隋王朝的忠仆”^{[8] 70}。

以上介绍的评价杨素的观点可谓大相径庭。的确, 要对这样一个出将入相、功过都非常突出、对隋朝政局影响匪浅的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并非易事, 再加上正统史学观点和以成败论英雄的评价观或多或少的的影响以及功过把握上的失度, 造成了对杨素评价的难度更大。笔者认为, 要对一个从行为到个性都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就必须按照历史主义的观点, 把杨素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的历史事件中进行全方位的分析, 并与同时代相关人物进行比较, 才能得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结论。

* 收稿日期: 2006-05-11

作者简介: 刘 明(1954—), 男, 江苏江阴人, 常熟理工学院管理工程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二、功臣之首褒扬有溢

作为隋朝著名的军事将领,杨素戎马生涯大半生,为隋的建立及政权稳定立下汗马功劳,史载“战无不胜,称为名将”^{[1] 1286},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杨坚为丞相,总揽国政。荊州刺史宇文胄起兵响应相州总管尉迟迥的叛乱。杨素受杨坚之命为大将军,击败宇文胄^{[2] 1509},为隋王朝的开创作出了贡献。公元581年,杨坚称帝建隋,中国仍然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杨坚为实现统一大业,立即着手进行南下灭陈的准备。杨素向朝廷“数进取陈计”^{[3] 1510},被拜为信州总管。杨素在永安大造各种战舰数千艘,训练水战精兵,为伐陈作准备。开皇八年(588年)十月,杨坚以杨广、杨俊、杨素并为行军元帅,兵分八路大举伐陈。狼尾滩之役,杨素当机立断,把握时机,分水陆两路夜袭,一战而得险要。既而遣散俘虏,对百姓“秋毫不犯”。沿江东下时,“旌甲曜日”,杨素端坐船上,容貌雄伟,使陈国百姓视之如江神而生畏惧,纷纷归服^{[9] 5499-5500}。杨素为隋的统一又立军功。开皇十年(590年)十一月,利益受损的江南大族纷纷起兵反叛。“大者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杀害长吏”^{[1] 1284},隋刚刚统一的局面又面临着分裂的威胁。杨素受命为行军总管,率大军平叛,仅用近两个月的时间就平定了江南之乱,为巩固统一局面再立新功。开皇末、仁寿初,杨素多次率大军击败经常南下侵扰、威胁隋安全的以剽悍善战闻名的突厥精锐之师,“自是突厥远遁,碛南无复虏庭”^{[1] 1286}。杨素为保卫隋朝边境安全又建战功。仁寿四年(604年),杨素率步骑数万讨伐汉王杨谅叛乱,行前“计日破贼”,率兵奇袭,大败叛兵,“谅穷蹙而降,余党悉平”^{[1] 1289}。

从上可见,杨素参与了平定宇文胄叛乱的战役,参与指挥了平陈战役,亲自指挥了江南平叛、北击突厥、平定杨谅等重大战役。他“戎狄严整”,赏罚分明^{[2] 1513};智勇相兼,深于谋略;屡出奇计,击敌制胜,时人把他和韩擒虎、史万岁并视为一代良将^{[1] 1346}。杨素为隋的立国、统一、固边、平叛屡立战功,功不可没。但说他“考其夷凶静乱,功臣莫居其右”^{[1] 1296},“是大隋王朝建国安邦的功臣之首”^{[9] 69},则褒扬有溢,与史实不尽相符。隋朝立国,定策之功应为首。北周大象二年(580年)五月,宣帝死,静帝年仅8

岁,未能亲理政事。刘昉以杨坚皇后之父,“有重名于天下,遂与郑译谋”^{[1] 1131},矫诏引杨坚入朝辅政,都督内外诸军事,从此掌握北周军政大权。杨坚上台全靠刘昉与郑译的密谋策划。及杨坚任丞相,以郑译为长史,刘昉为司马,两人成为杨坚的重要心腹,“前后赏赐巨万,出入以甲士自卫,朝野倾瞩”,“时人为之语曰:‘刘昉牵前,郑译推后’”^{[1] 1132}。可见,杨坚立国定策之功应归于刘昉、郑译,而笔者未见有杨素参与的任何史料。不能因刘昉、郑译是奸佞小人,后贪污、谋反而埋没其定策之功。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六月,杨坚即将代周之时,引起忠于北周的三总管的起兵反抗。其中相州总管尉迟迥的兵力最强。杨坚遣老将韦孝宽率军镇压,关键时刻又派才兼文武、忠心耿耿的高昉为监军,出谋划策,最后平定尉迟迥的叛乱,为杨坚建隋扫清了道路,而杨素只是击败了响应尉迟迥叛乱的荊州刺史宇文胄,功劳孰大孰小一目了然。

关于平陈之役,在此就杨素与其他平陈功臣的功劳大小作一评价,具体从献平陈之策和参与平陈战役两方面来分析。

隋文帝曾广泛征求平陈策略。贺若弼、高昉、崔仲方的平陈之策史有详载,值得一提。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贺若弼的“取陈十策”^{[2] 2380},本传列举“七策”,主要精神为:伐陈战争是一次突然袭击;必须事先制造一些假象,麻痹敌人;先取京口仓储,速据白土冈意义重大;遣散俘虏,扩大文帝敕书的影响,瓦解陈方军心^{[2] 2381-2382}。可见,贺若弼的“取陈十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从平陈战役的实际情况看,其基本内容大体得到了贯彻。高昉的平陈之策是用经济战消耗陈的实力:“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文帝“行其策,由是陈人益敝”^{[1] 1181},达到了削弱陈的经济力量、破坏陈的军粮供应的目的。至于军事方面,他也主张给陈军制造假象,借以麻痹对方,为发动突然袭击创造有利条件。崔仲方对平陈军事布局的建议极其周密:“今唯须武昌以下,蕲、和、滁、方、吴、海等州,更帖精兵,密营度计;益、信、襄、荆、基、郢等

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诸军鼓行以前”^{[9] 5493-5494}。文帝采纳了这个切实有效的完整的军事计划,择将置军。另外,李德林、王颁、高劼等也争向隋文帝献平陈之策。杨素虽史载“数进取陈之计”^{[1] 1282},但笔者查遍《隋书》、《北史》、《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未见杨素取陈之计的具体内容。由此推测,不是史官有意回避不写,就是杨素之策平平。所以,在献平陈之策方面,杨素是不能和贺若弼、高颎、崔仲方等人相比的。

文帝对平陈战役作了精心准备,根据高颎的推荐,在陈政治中心对江的重镇,安排了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韩擒虎为庐州总管;以秦王杨俊为山南道行军元帅,“督三十总管,水陆十余万,屯汉口,为上流节度”^{[2] 2467};以杨素为信州总管,督造战船,训练水军,形成隋军沿长江北岸的整体部署,从战略上呈全线出击的态势。但布置在长江下游的贺若弼、韩擒虎部是隋军的主力,直接威胁陈叔宝的小朝廷,他们所面对的是陈最重要的武将南徐州刺史萧摩诃和吴兴内史任蛮奴,此二人所部是南方的主力部队。可见在长江下游展开的战役对战争全局具有决战意义,而上游军队只是偏师。在平陈战役中,贺若弼在此前设计麻痹陈军的基础上,巧妙地选择元旦贺新这天率军渡江,“陈人弗之觉也”^{[1] 1344},他屡败陈军,特别在蒋山之白土冈与陈军主力进行决战,消灭了陈主要有生力量,最后直捣陈都建康。文帝迎劳贺若弼曰:“克定三吴,公之功也”^{[1] 1345}。有“文武才用”^{[1] 1339}的韩擒虎在平陈战争开始之际,亲“率五百人宵济,袭采石”,连战皆捷,“遂平金陵,执陈主叔宝”。文帝诏曰“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数百年寇旬日廓清,专是公(贺若弼、韩擒虎——笔者注)之功也”^{[1] 1340}。平陈战役的五十万大军,虽“皆受晋王节度”^{[9] 5498},但“晋王以幼稚出藩”^{[1] 1474},面对变化万端的军机,需要有谋略过人的军师为之筹划,文帝命高颎为晋王元帅长史,协助指挥全局,实际上“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文帝赞曰:“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1] 1181}。而杨素在平陈战役开始时,被任为行军元帅,率领水军顺江东下,过三峡,多次大败陈军,颇有战功。从以上分析可见,在平陈战役中,以功劳和

作用论,杨素都难以与高颎、贺若弼、韩擒虎相比。笔者同意隋唐史专家胡如雷的结论,平陈战役功臣的名次为:高颎、贺若弼、韩擒虎、杨素^{[10] 55}。杨素平定江南叛乱和杨谅叛乱的功劳确实无人可比,但这与隋立国、平陈的功劳相比要逊色得多。

所以,杨素有大功于隋,是隋统一、巩固的功臣,可难称功臣之首。

三、亡国元凶贬抑太甚

杨素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对隋朝的兴衰存亡,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史家认为,杨素有过于隋的史实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大肆营建,劳民伤财。一是督建仁寿宫。开皇十三年(593年),文帝要在岐州(今陕西凤翔)之北建一座仁寿宫,命杨素督造。杨素广征百姓,“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死者以万数”^{[9] 5539-5540}。“及宫成,上令高颎前视,奏称颇伤绮丽,大损人丁,高祖不悦”^{[1] 1285}。文帝亲去视察,见宫殿如仙境中的琼楼玉宇,勃然大怒,斥责杨素是“殫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9] 5548}。杨素忧惧,计无所出,只能向文帝最信任和畏惧的独孤皇后求情:“帝王法有离宫别馆,今天下太平,造一宫何足损费”^{[2] 1512}。果然,文帝不但没有惩处杨素,还大加赏赐。二是营建东都洛阳。大业元年(605年),炀帝命杨素担任营建东京大监,全面负责东都洛阳的营建。“每月役丁二百万人”,10个月完成。“发大江之南、五岭以北奇材异石,输之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9] 5617-5619}。“筑西苑,周二百里;其内有海,周十余里;为蓬莱、方丈、瀛洲诸山,……堂殿楼观,穷极华丽。”^{[9] 5620}。

其二,排除异己,陷害忠良。《隋书》本传载:“朝臣有违忤者,虽至诚体国,如贺若弼、史万岁、李纲、柳彧等,素皆阴中之”^{[1] 1288}。贺若弼、史万岁、韩擒虎与杨素是隋朝公认的四大名将。高颎曾对文帝评价道:“朝臣之内,文武才干,无若贺若弼者”^{[1] 1344},平陈之战“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1] 1182};“史万岁雄略过人,每行兵用师之处,未尝不身先士卒,尤善抚御,将士乐为致力,虽古名将未能过也”^{[1] 1355}。文帝深以为然。杨素妒贤嫉能,陷害忠良。贺若弼与杨素为表兄弟,深知杨素为人,又

自恃功大,对彼为相、己为将不服,口出怨言。杨素进谗言,使文帝将贺若弼免官,并除名为民。史万岁是杨素部将,因深得士卒爱戴,杨素必欲除之而后快。开皇二十年(600年)史万岁抗击突厥大获全胜而归,杨素妒其功,在文帝面前设计陷害,以至引起文帝大怒,史万岁在殿堂上被当场打死,罪名曰“怀诈要功,便是国贼。”“天下士庶闻者,识与不识,莫不冤惜”^{[1] 1356-1357}。治书侍御史柳彧因事忤杨素,杨素怀恨在心,只是柳彧为文帝信任,杨素一时无法摧毁。柳彧因与蜀王杨秀有交往,待杨秀被问罪,杨素就迫不及待地上奏柳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1] 1484}。杨素连对有推荐之恩的高彧,因其有可能阻碍他的前程、威胁他的地位也排挤陷害。以至高彧罢相为民,险些问斩^{[9] 71}。

其三,营私易储,助广夺嫡。杨素为永享荣华富贵,在改立太子的过程中推波助澜,帮助杨广夺嫡成功,其间可谓不择手段,打击对手不遗余力。首先取得独孤皇后的支持,通过自己或皇后派去乱伺太子的人出面,在文帝面前频频指责太子失德怨望,疏离父子感情;进而裁减东宫护卫,贬斥反对废立的朝臣,为夺嫡扫清障碍;最后收买东宫幸臣姬威诬指太子入罪,在奉命按问中锻炼成狱,杨广夺嫡终于成功。以后废太子屡次呼冤,都被杨素所阻。杨素又诬指有不平之心的蜀王入罪,使之废为庶人并被幽禁。最终杨广即位也是在杨素矫诏、调动东宫卫士,控制宫廷,采取非常手段的情况下成功的。杨素是助广夺嫡和即位的第一功臣。而杨广是一个被后世公认为残忍暴虐、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故历代史家认为,杨素与杨广互相勾结、利用,隋又在杨广手中覆亡,杨素罪莫大矣。

对上述记载和史家的看法,笔者有一己之见,主要如下:

关于督建仁寿宫劳民伤财,结怨天下,导文帝由俭入侈,主要责任不在杨素。理由有三:一是营建仁寿宫是文帝为供他和独孤皇后颐神养寿而命令建造的,杨素是奉命行事;二是文帝虽斥责杨素,但最后非但没有追究责任,反而是大加赏赐,“及入新宫游观,乃喜,又谓素为忠”^{[1] 683},可见文帝从内心对杨素的作为是赞许的,也表明了文帝建国初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勤政之心逐渐消失,这对素以节俭著称的夫妇开始变得乐于安逸了;三是此后文帝与独孤皇后在八年中十一次幸居仁寿宫,车骑銮驾,扈

从万千,沿途百姓,烦劳供顿,惊扰不已,也是明证。

关于营建东都洛阳,更要深加探究。一是营建东都便于控制全国,因为洛阳地势险要,位置适中,交通方便。从政治上看,洛阳便于对关东和江南地区的控制。在平叛过程中,炀帝已深感“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从经济上看,当时关中物资不足以供应统一后隋中央政府的需要。早在开皇年间,关中一遇荒年,文帝就不得不率大小官员就食洛阳。东南殷富,是王朝财源所在,洛阳位置适中,“水陆通,贡赋等”^{[1] 61},便于转运东南物资济京师。炀帝在位期间,居长安不到一年,而在洛阳却有四年有余,足以说明这一点。二是负责营建东都还有“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1] 6}等人。杨素上有炀帝诏令,下有杨达、宇文恺辅佐,营东都副监宇文恺也起了很大作用,“恺揣帝(文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1] 1589}。所以,营建东都劳民伤财,不应由次年去世的杨素负主要责任。三是营建东都如此大事在《隋书》和《北史》的杨素本传中均只有一句记载,是史官无意忽略还是有其他用意?四是督建仁寿宫和营建东都由杨素负责,是因杨素“驭戎严整”,用管理军队的办法督工最有效。杨素奉命行事,不应全负劳民伤财的罪责。

关于排斥异己,陷害忠良,这与文帝黜杀功臣密不可分。文帝“猜忌苛察”、“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1] 54},“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1] 55},高层官员“倍受谗言”^{[9] 5602},常用而复贬,贬而复用,“忠臣义士莫得尽力竭辞。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1] 54}。黜杀功臣,须得用奸臣为鹰犬,罗织陷害,否则黜杀无名。就拿史万岁来说,开皇三年(583年)因罪充边,后又于对突厥的战争中崛起,功至太平公;然而开皇十八年(598年)又因罪为民,同年又因边事复用,后又因文帝吝赐有功将士而据理力争,结果获罪于文帝,当廷杖死。如果说文帝打死史万岁的当时是出于受杨素蒙蔽而一时激忿,但事后岂能不知是杨素的诬陷?岂能不加以制裁?史载文帝“悔之不及”,但人已死,干脆诏其罪,以饰己过^{[1] 1356}。杨素只是窥知了文帝的心思,投其所需充当鹰犬。所以杨素能“作威作福”、“朝廷靡然,莫不畏附”^{[1] 1288}。翻检历史可知,奸臣得逞有时也与君王纵容、利用有关。

关于助广夺嫡,笔者认为杨素只是在文帝和独

孤皇后有易储意愿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帝和独孤皇后躬俭治国,对自己儿子亦苛求朴素,稍有侈靡即不悦,太子杨勇即因“率意任情,无矫饰之行”,多于“内宠”,文帝“恐致奢侈之渐”^{[1] 1230},又因在冬至时接受百官朝贺而引起文帝忌恨,自此“恩宠始衰,渐生疑阻”^{[1] 1231},到开皇十八年时,文帝与杨勇的关系已到了形同仇敌的地步了^{[9] 5578}。杨勇又因不喜皇后为他选的元妃而获罪于母后,竟至“后弥不平,颇遣人伺察,求勇罪过”^{[1] 1231}。杨勇既无多大建树,又失爱于帝后,失位是情理中事。而杨广则颇有政治、军事才能,且笃学博识,多才多艺,受朝野瞩目。史载杨帝“爱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1] 95}。他又矫饰伪装,善于表现和投帝后所好,帝后“由是爱之特异诸子”^{[9] 5574},“当时称为仁孝”^{[1] 59},在帝后心中有特殊位置。可见,杨广既久有贤名,又敏于应付,善会人意,矫饰伪装,有意夺嫡,文帝和独孤皇后也渐起易储之心。杨广窥知父母意图,便勾结杨素,终于使废勇立广成为事实。客观地讲,杨素在这一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若非文帝与独孤皇后早有易储之心,杨素也难以推波助澜。因为在易储事件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杨素,史载“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1] 1109};文帝在废勇时也说:“此儿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劝我废之”^{[1] 1234},在临死前还有“独孤误我”^{[9] 5630}之叹。这些记载清楚表明,独孤皇后在易储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平心而论,废勇立广本身不能算是错事。至于杨广即位后的作为与亡国之祚,皆文帝、独孤皇后、杨素等始料不及。王夫之也认为:“文帝废勇而立广,虽偏听悍妻,致他日有独孤误我之叹,然当广恶未著,勇德有愆之日,参互

相观,亦未见废立之非社稷计也”^{[4] 553}。笔者认为,不能把以后隋亡杨广之手作为贬斥杨素的依据。

杨素作为助广夺位的首要功臣,在大业初的地位可说是无人能出其右。杨帝封他为尚书令、司徒,名位已极而实权被削,“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情甚薄。……素寝疾之日,帝每令名医诊候,赐以上药。然密问医人,恒恐不死”^{[1] 1292}。杨素也知道自己参与密谋太多,又以功高无以加赏,再加上对杨帝为人、性格的了解,所以不肯服药,很快死去。这是大业二年的事情。可以想见,杨素在大业年间除营建东都外,就没有什么作为了。所以,认为杨帝暴政致隋亡的责任也要由杨素来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据以上分析可见,杨素对隋朝是有一定过失的,对隋朝的灭亡是有一定责任的,但认为杨素“致国于倾危”,“是祸国殃民,导致隋王朝灭亡的元凶”却与史实有较大出入,言过其实,贬抑太甚。所以,杨素不是祸国殃民、导致隋亡的元凶,而只能算是帮凶。

参考文献:

- [1]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2]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3] 吴兢. 贞观政要[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4] 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5] 范文澜. 中国通史: 第3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 [6] 沙宪如. 论杨素[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1999(6): 69—72.
- [7] 刘思怡. 隋代名将杨素评说[J].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1999(3): 72—76.
- [8] 崔瑞德. 剑桥中国隋唐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 [9]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10] 胡如雷. 隋朝统一新探[J]. 历史研究, 1996(2): 46—55.

Correcting of Yang Su' Merits and Demerits

LIU Ming

(Management Engineering Dept., 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Yang Su is a historic person having great influence 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ui dynasty. He has numerous battle achievements for the foundation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me of the Sui dynasty. He is a distinguished person for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but not the foremost one. He excluded people of different views, framed faithful ones, sought private gain and changed the crown prince. He had helped Yang Guang snatch the throne, who implemented despotic rule after enthronement and finally resulted in perdition of the Sui dynasty. However, Yang Su is not the prime criminal for the perdition of the Sui dynasty, but the accessory. That is the truth of the history.

Key words: Yang Su; Sui Dynasty; distinguished person for the foundation of the state; accessory for the perdition of the state